



新闻出版研究生系列教材

中外 出版史

宋原放
李白坚

陈生铮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闻出版研究生系列教材

中外出版史

宋原放 陈生铮
李白坚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60号

•

中 外 出 版 史

宋原放 李白坚 陈生铮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怀柔东晓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125字数:250千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

ISBN7-303-00758-X/G·432 定价:8.50元

目 录

上篇 中国出版史

(宋原放 李白坚)

绪 论	(3)
第一章 雕版印刷术发明前的文字传播	(11)
第一节 最初的文字传播形式及其进化	(11)
第二节 手抄是早期著作物的复制手段	(20)
第三节 初期的编辑工作和书籍市场的萌芽	(26)
第二章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30)
第一节 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前提	(30)
第二节 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时间	(36)
第三节 雕版印刷术发明前后书籍形式的演变	(41)
第三章 书籍出版的黄金时代	(47)
第一节 雕印出版的普遍发展	(47)
第二节 三类书籍出版系统的出现	(52)
第三节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63)
第四节 频繁的出版活动	(68)
第四章 古典文化总结时期的书籍出版	(73)
第一节 明清时期出版事业持续繁荣的原因	(73)
第二节 科技书籍出版的新潮流	(85)
第三节 清代学术与古籍整理出版	(93)
第四节 出版机构与出版家	(103)

第五节 印刷技术再放异彩·····	(110)
第五章 中西文化冲突中的近代出版事业·····	(117)
第一节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出版业·····	(117)
第二节 现代印刷技术的输入及新型出版机构的出现 ·····	(124)
第三节 翻译出版事业方兴未艾·····	(134)
第四节 新闻出版事业异军突起·····	(147)
第五节 版权思想的萌芽与早期出版法·····	(154)
结 语·····	(169)

下篇 外国出版史

(陈生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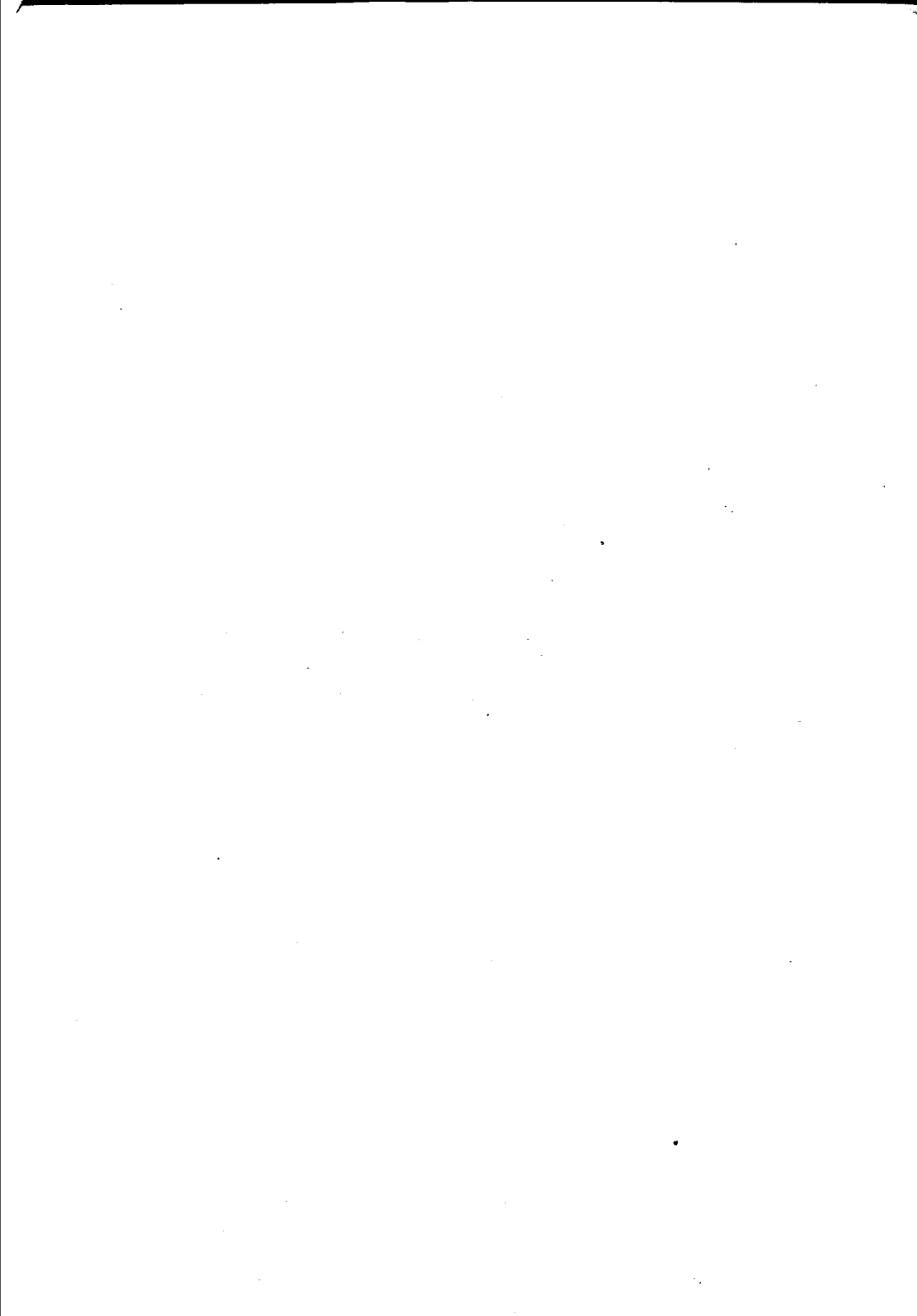
前 言·····	(175)
第一章 文字的演变和早期的书籍·····	(176)
一、古埃及 ·····	(177)
二、两河流域 ·····	(181)
三、字母文字 ·····	(184)
四、古印度 ·····	(185)
五、古希腊 ·····	(188)
六、古罗马 ·····	(191)
七、《圣经》 ·····	(193)
八、羊皮书 ·····	(195)
九、古代图书馆 ·····	(196)
第二章 中世纪书籍·····	(199)
一、隐修院 ·····	(199)
二、非宗教书籍 ·····	(201)
三、文艺复兴 ·····	(203)

四、阿拉伯书籍	(210)
第三章 欧洲印刷术及古版书	(213)
一、活版印刷术的诞生和传播	(213)
二、古版书	(216)
第四章 宗教改革与书籍审查	(219)
一、宗教改革运动	(219)
二、人文主义的印本书籍	(220)
三、书籍审查	(221)
四、书目编制的进展	(222)
第五章 近代书籍业	(224)
一、荷兰	(224)
二、法国	(225)
三、德国	(229)
四、英国	(231)
五、美国	(235)
六、其他国家	(236)
第六章 报刊出版业的起源与发展	(239)
一、古代报纸	(239)
二、报纸的雏形	(240)
三、早期报纸	(240)
四、早期期刊	(242)
第七章 19 世纪书籍业	(245)
一、印刷技术的发展	(245)
二、著名的出版社和出版商	(247)
三、资产阶级革命和图书馆	(251)
第八章 18—19 世纪的报刊业	(255)
一、英国	(255)
二、美国	(258)

三、法国	(262)
四、德国	(265)
五、其他国家	(266)
六、期刊的演进	(267)
第九章 版权保护的演进	(271)
一、版权法的产生与发展	(271)
二、国际版权保护	(275)
三、发展中国家为版权利益而斗争	(279)
四、国际版权组织	(281)
第十章 现代书籍业	(283)
一、书籍业的发展	(283)
二、大萧条	(288)
三、集中与垄断	(290)
四、重要专著	(292)
五、原苏联、东欧国家书籍出版业	(296)
六、藏书现代化	(300)
第十一章 20 世纪的报刊业	(302)
一、科技进步	(302)
二、兼并与垄断	(304)
三、重要的报纸和通讯社	(308)
四、原苏联的报刊和通讯社	(313)
五、期刊的趋势	(315)

上篇 中国出版史

(宋原放 李白坚)



绪 论

中国,5000年的文明古国,3500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使她成为世界上最具魅力的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人类文明史上,与中国同样古老的国家尚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但是像中国那样,具有绵延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从未间断;像中国那样,几乎一切历史上出现过的文化形态,都已载入史册,书于竹帛,并且“藏之名山”的国家,恐怕难以寻觅。

究其原因,中国历代发达的书籍出版事业对古国文化的保存、积累、粘合和促进作用,不可低估,中国书籍出版事业为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历史文化与中国历代的书籍出版事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丰富的出版物是文化繁荣的结晶,而文化则靠出版的书籍得以推陈出新、源远流长。出版事业和出版物,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民族精神的物质凝聚,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很难设想,一个没有丰富的精神文明产品的民族,一个不注意把自身的文化铸入物质外壳——书籍之中,从而激励自身发扬光大、锐意进取的民族,堪称具有文明传统的民族。而中华民族正是以她那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人类文明史上获取了重要的历史地位。

据不完全记载,早在约2000年前的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就把国家藏书库天禄阁、石渠阁的藏书进行了一次大清理,得书13269卷。

西晋时秘书监官员荀勗对秘阁藏书也做了一次清理,这次得书29945卷。200多年间,书籍馆藏数增加了一倍多。

南北朝时宋元嘉八年(431年)秘书监谢灵运受命编纂国家四

部藏书,计得书 64582 卷。

到梁元帝时(552 年—554 年)江陵国家藏书已达 7 万卷之多。

隋统一中国后,十分重视典籍收籍,以《隋书·经籍志》收录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官私书目为例,该志把所有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7 类,总计书 14466 种,89666 卷。

从以上数字,略可表明,半个世纪中,图书正在作几何级数的增长。

唐朝前后,雕版印刷术率先在我国出现了,在先进生产技术的武装下,图书出版更趋发达。经宋元迄明清,出版事业突飞猛进,出版典籍的内容已经空前丰富,数量更是多到难以确切估计。

明朝一部《永乐大典》即收书 22877 多卷,七八千种。清朝编纂的《四库全书》更是洋洋大观,共收书 3461 部,79309 卷。此外“存目”尚有 6793 部、93551 卷。据不完全统计。清政府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国家有关部门所掌握的典籍文献实际上共有 10254 部,共 172860 卷。只不过由于政治原因,很多典籍没有收入《四库全书》罢了。

历史跨入近代后,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引起了中西文化冲突的影响和新型印刷技术输入的刺激,新闻出版业与翻译出版业在斗争中发展,出版物的内容和数量又在成倍增长,呈不可遏止之势。纵观中国出版史,各种类型的图书出版始终处于后浪推前浪的澎湃发展之中,从来没有停顿过。

中国历史上的出版物不仅数量繁多,而且种类也十分可观。倘以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就可将书籍划分成几十个门类,几乎囊括了人类文化的全部内容。

如:经部,就有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讖纬、小学等 10 余种;

史部,分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 13 目;

子部,有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家、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等 14 目;

集部,有楚辞、别集、总集等 3 目。

此外,还有道经部、佛经部下设 7 个子目。

中国古代出版物之多,使得任何一个稍涉此道的人都不得不叹为观止,以至只有先阅读诸书之目录提要,才能略略摸清此中门径。

中国历史上各种书籍的出版,与中国文化的每一个进步,几乎是同步进行的。经常是一个朝代刚刚完结,甚至于还未曾衰败,该朝的历史已经在纂修,而每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典章、制度、风俗、习惯、语言、服饰、饮食、起居,几乎都有书籍予以记载。这是因为,中国人民历来具有尊崇历史,珍惜古籍文献,重视历代书籍典藏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具备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出现了“内史”、“左史”、“右史”的分工。“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的记载,表明从那时起,史官们就有意识地将有价值的史实分门别类记诸史册了。

《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孔颖达注疏说:“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士人追求道德完善的最高境界。然而“立德”、“立功”有时并非人力所能企及,退而求其次,于是“立言”以垂诸史册,就成了世人追求的目标。

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把“立言”的思想发展得更为直接而具体,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把写文章看成最有意义而永垂不朽的唯一事业,在他那里,仿佛连立德、立功也在其次了。

崇拜“立言”,就必然重视“言”的书籍外壳在历史长河中的流

传作用，崇“言”必尊“史”。所以近代杰出的思想家龚自珍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他把一个国家的历史及其文献典籍，看作为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为崇敬历史而“立言”，在“立言”中包蓄历史，历史正未有穷期，立言之举将代代相传，这是多么强烈的历史意识！

正是在这种顽强的历史意识的支配之下，中国历代的著作家、出版家、藏书家和千万炎黄子孙才百般努力，一些帝王将相才极端重视，在书籍的著述、编纂、编辑、校勘、考订和整理中，使中国本来散见于各个领域的文化精髓几乎无一遗漏地注入到“千车载不尽、万船装不完”的历代书籍出版物之中。以至出现了校勘古籍，日以继夜，在竹帛之中度过一辈子的汉代编辑校勘家刘向、刘歆父子；“缩衣节食，遑遑然以刊书为急务”、“头颅如雪、目睛如雾，尚矻矻不休”的明代出版家毛晋；“一生筹活版，半世作雕虫”，为创制泥活字不惜“经营卅载功”的清人翟金生；“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书，溢于几篋”的晋代藏书家张华；“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卒多异本”的南梁藏书家任昉；家中书籍遭火，“乃手写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篋”的南朝 80 高龄老翁沈麟士……。是这些人物，组成了中国出版事业的脊梁。

正是在这种顽强的历史意识支配之下，中国人民世代努力，中国发明家、科学家殚精竭虑，发明并改进了纸张，发明并改进了雕版印刷、活字印刷，使中国出版事业的腾飞得到了技术上的保证。与此同时出现的政府的出版机构、个人出资刻书的出版家以及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书坊和书肆，使中国的出版事业取长补短，各逞其能，充分满足了日益丰富的精神产品复制、出版、贮藏留存的要求。

我国是一个学术渊源丰厚的文明古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已争鸣于朝野，汉末隋唐以降，佛道哲学，又风行于社会，几千年来，学术思潮，各领风骚，学者巨擘，层出不穷，各朝有首开风气之人，历代有卷帙浩繁之作。学术思想的发达，学术著作的撰述，向社

会提出了推广与传播的要求,而学术著作的手抄流传以至雕印出版,则是使这种要求付诸实现的唯一途径。中国学术及其著述的无比精深博大,是诱导中国出版事业发达的又一个活跃因素。

请以经学为例:

经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显学,是封建专制制度得以维持的精神支柱。而中国出版史的发轫之初,就伴随了经学的赓续与发展、融汇与分流,有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姻缘。

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前,为使经书流传,曾屡刻石经,以求永年。经书勒石,在本质上是使同一著作能无舛误地重新复制,实在是书籍出版的先声。雕版印刷发明之后,在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开天辟地第一次由国家主持的大规模雕版印刷活动,无例外地还是刊刻经书——九经。出版九经,是经学史上的壮举,更是出版史上的盛事。从此,政府的出版活动,皆循“正经”、“正史”的道路,出版事业也责无旁贷地“载”起“道”来,逐渐成为封建阶级的舆论工具。经学书籍的大量出版,衍生出一系列相关的学术来,如版本学、目录学、校勘与辨伪、考证与编辑,这类学术既为出版学术,却骑经学之墙,可谓一身二任焉。

如最初的版本之争,即始于经书版本的纠葛。秦火之后,经书荡然无存,汉武帝时广征散佚经书,有人从先朝遗老口中录得背诵出的经句,以今文(隶书)书录之,便成为今文经。后又有人从孔壁夹层中得遗经数卷,因该书是以先秦的篆文书写,故相对今文(隶书)来说,称作古文经。两种经文对勘,发觉其间字句相左的不少。于是顿起版本之争,而今古文版本之争,往往涉及到哲学观、政治观和历史观。这样,哪种经学派别得势,哪类观点行世,就将影响到彼时彼地经籍出版的情况。

又如,对古籍文献的编次和整理,始于孔子。孔子整理古文献,首先依据一定的标准,加以审慎的鉴别,然后将选取的篇章按照不同的情况,加以不同的处理。《尚书》按时代编次。《诗经》则以诗的

性质和诗产生的地域分门别类，各篇又有一定的先后次序。如《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各篇还作序录，以“言其作意”。孔子这一系列的编次经书的工作，既是目录学的工作，又是编辑学的一项重要内容，自然这些又起源于经学之中。

如果说，经学是封建社会的显学，那么，儒家思想，则是中国封建意识中的正统所在。孔子作为儒家大圣，人，同时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编辑家，他的编辑思想就很富代表性、权威性和延续性，在出版史的长河中，明里暗中左右乾坤，潜移默化，影响深远。孔子当时的编辑原则有三，一是“述而不作”，即保持原作的文辞，不随便添加己意；二是“不语怪力乱神”，即要删削芜杂行文，去除怪诞的部分；三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是要排除一切不符合统治阶级立场的议论，文以载道。孔子就是以这些原则整理“六经”的。倘若检验一下中国数千年来编辑、出版的线索，在后来的编辑家和出版家中，似很少有越出孔子编辑原则之雷池者。

中国出版史上，那些立论新颖、见解独到而又文不尽其美的有争议的著作，大都难以出版，或虽经出版却遭到版毁人亡的结局，这根源，或许要上溯到孔夫子。孔子是“圣之时者”，他的思想，哪怕是有关编辑出版的思想，也总是赢得历代统治阶级青睐的。

从上所述，已可见仅出版史与经学学术之间就有许多“交叉”的“结合部”，以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牵涉，互为包容。

中国出版事业和中国传统学术的结合，是中国出版事业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这种紧密的关系，促使中国的出版事业带有一种科学的求实精神。版本目录之学，校勘考证之兴则是这种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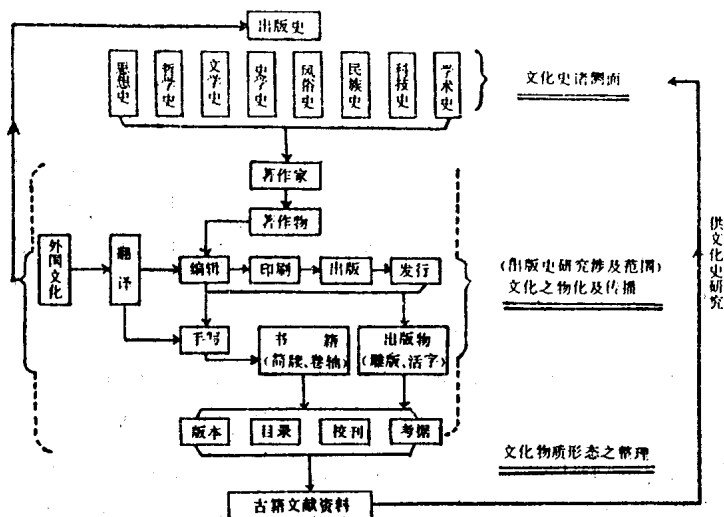
清代文字狱空前惨酷时，我国出版事业并未因此停顿。我国清代的伟大学者们潜心学术，“述而不作”，总结整理了千年的文化遗产和竹帛典籍，写出了大量总结性著述，从而使清代出版事业依旧

超越前代,奇峰突起,这不能不说是出版史上的奇迹。而这奇迹的出现,是和中国出版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关系分不开的。

中国是书籍出版的泱泱大国,也许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多少年来,我们很少把出版当成一门科学来研究,虽然仅从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算起,中国也已有 1200 多年的出版历史,但迄今为止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出版史著作,反映不了博大悠远的中国出版史实,无法总结丰富复杂的中国出版发展规律。但是,近年来出现的“文化热潮”却像一阵春风吹入出版界,因之出现了一种编“史”写“学”的高潮。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观上是总结本学科的规律和历史,客观上却适应了本民族在对外开放和改革中,对传统文化的回顾、整理、自省和反思的要求,迎合了面对“四化”的艰难历程,搜寻中外文化鸿沟的民族心理的需要。出版史、出版学课题的提出,与中国目前文化发展的态势有密切的联系,它既顺乎文化发展之潮流,又合乎中西文化交流之机遇,它的酝酿、探讨、研究,都将离不开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它是中国 20 世纪末文化发展的产物。

如果说,今天对出版史的研究,和当今的文化发展密切关联。那么,古代的出版历史,也与彼时彼地的文化史密切关联。之所以说中国有几千年的古国文化,是因为中国富有几千年文字可考的历史,有汗牛充栋的书籍出版物。而这些遗留下来的书籍出版物,是中国文化经过积累、筛选、淘汰、精炼之后存留下来的物质形态之一,是物化了的中国文化宝藏,其中包含了中国文化长河中大量的“遗传因子”和文化信息。文化史必须以这些书籍为资料,展示中国文化的进程。出版史则研究文化史诸侧面(如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风俗史、民族史、科技史、学术史等等)的物化及传播过程。出版史将研究文化的“软件”(思想、学术、风俗、习惯等)怎样演变成了“硬件”(书籍和出版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版史堪称文化史的技术构成史,是文化史的重要结构部分。

出版史与文化史背景之关系,如图所示:



从上图不难看出书籍出版和文化史之间的关系。出版史由研究文化史的诸侧面之物化、传播过程而来,同时,本身又是供文史研究的诸侧面、诸对象之一部分。出版史在文化史的包容之中,在复杂的但并不模糊的互相牵涉中,形成了一种文化生成的大回环。因此,把出版史置于整个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看来是科学的。

鉴此,在撰写这本《中国出版史》时,我们特别重视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状况对出版事业的制约和影响,把出版史看成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力图突破以往史学研究中的无形束缚,既注意社会政治制约,也看到文化发展背景的作用,从纷繁复杂的史实中,清理出一条较为明晰的出版史线索。